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探源

□李国镇 胡怀国

[摘要]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共同富裕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伴随着西方式现代化的进程,古典经济学围绕经济发展问题对共同富裕理论进行了早期探索。马克思对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作了深刻反思,强调人的发展,为共同富裕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了共同富裕理论体系的形成,在实践探索中推动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并推动了共同富裕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研究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需坚持三项原则: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第二,吸收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经验及理论成果;第三,在新的征程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

[关键词] 共同富裕;古典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F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22)04-0016-09

[DOI] 10.13529/j.cnki.enterprise.economy.2022.04.0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0ZDA01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项目编号:16ZDA002)

[作者简介] 李国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北京 102488)

胡怀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北京 100836)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article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the theory of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history. Along with the process of western-style modernization, classical economics conducted an early exploration of the theory of common prosperity around the issu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arx made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 road of western-style modernization, emphasize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laid a soli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theory of common prosperity.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mmon prosperity, promoted theoretical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and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common prosperit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new pat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needs to adhere to three principles: firstly, adhere to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of Marxism; secondly, absorb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fruits of the western-style modernization road; thirdly, stick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n the new journey and implement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classical economic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一、引言

当前,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共同富裕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为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工作,“十四五”规划纲要对共同富裕目标提出了阶段性要求。在此背景下,共同富裕问题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1-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这个提法将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紧密联系起来,使后者与传统西方式现代化区别开来。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域下的概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这指明了共同富裕包括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两个基本维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则可以进一步溯源至古典经济学,其对后者进行了批判继承并实现了理论超越。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进行,古典经济学家们对经济问题的关注点发生了渐进的变化,他们对经济增长与分配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开启了对共同富裕理论的早期探索。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与继承,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视角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展望,指出在生产水平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将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古典经济学将共同富裕的内涵局限于经济发展维度相比,马克思将其延伸至人的全面发展,这大大丰富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为共同富裕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先富带后富”及“分阶段推进”等共同富裕相关理论,推动了共同富裕理论体系的形成,在实践探索中促进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并加速了共同富裕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

共同富裕理论的发展脉络表明,共同富裕理论经过了两次重要的转折。第一次是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古典经济学主要围绕西方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问题对共同富裕理论进行了早期探索,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超越,对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作了深刻反思。第二次是从马克思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我们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坚定道路自信,共同富裕理论不断深化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有益探索。因此,共同富裕理论的发展过程见证了从西方式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转变。共同富裕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对该问题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坚定理论自信,还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进行理论梳理,为改革实践提供理论指引及现实启发。

二、文献综述

随着共同富裕逐渐成为新的热点研究主题,学者对共同富裕展开了广泛研究,既包括科学内涵、思想演进等理论研究,也包括实现路径、道路探索等实践研究。学者对理论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化。罗明忠(2022)^[4]系统梳理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发展脉络,指出共同富裕经历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早期设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探索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实践基础上的丰富和发展这三个主要发展阶段。杨文圣和李旭东(2022)^[5]指出,共有、共建、共享是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共有”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建”凸显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共享”彰显了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邱海平(2016)^[6]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第一是应从历史发展规律角度准确把握共同富裕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具有的不同含义;第二是不能把马克思所论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富裕直接应用于我国现实;第三是共同富裕既是目标又是手段;第四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消费资料分配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第五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深入研究影响我国收入分配的具体机制和因素。唐任伍等(2022)^[7]指出,共同富裕的思想演进主要经过了中国历代先贤开始追求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同富裕而奋斗

目标和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四个阶段。

与理论研究类似,学者结合实践开展的研究也逐步增加。方宁(2022)^[8]指出,新发展理念从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有效路径,其中,创新、协调、绿色理念有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而共享理念则有助于改进分配格局,使发展成果更加公正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范从来和谢超峰(2018)^[9]指出,益贫式增长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有效路径,通过在共建共享中加快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速以统筹增长与分配、效率与公平。覃成林和杨霞(2017)^[10]指出,先富地区主要通过经济增长的空间外溢作用带动其他地区实现共同富裕,且空间外溢作用具有明显的局域性和差异性,因此为实现共同富裕,既要改善先富地区空间外溢条件,扩大其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的空间范围,也要关注先富地区带动作用所不能及的其他地区,依据增长极理论设计新的区域战略及政策,促使其富裕起来。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

虽然国内学术界在共同富裕主题上已取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现有文献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多数文献仅仅将共同富裕理论溯源至马克思,而对马克思的共同富裕理论源头鲜有探讨。基于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对共同富裕理论进一步溯源至古典经济学,并沿着“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脉络对共同富裕理论作出比较完整的理论探源。

三、古典经济学对共同富裕理论的早期探索

古典经济学贯穿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全过程,主要代表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等。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这些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问题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并发展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古典经济学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的理论回应,其科学见解及人文精神包含了关于共同富裕的若干内容,对其进行研究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共同富裕进行的早期探索。

(一) 经济增长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分别生活于英国工业革命的早期和中期,经济增长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主题,因此也成为他们研究的重点。不同之处在于,斯密是直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李嘉图则是通过考察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来研究后者。^[11]相反,生活于工业革命完成时期的约翰·穆勒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

1. 亚当·斯密的经济图景

斯密从劳动分工及决定分工程度的市场范围两个方面研究经济增长。斯密指出:“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品由于分工而大增”^[12],这表明斯密肯定了劳动分工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开辟新市场可以扩大市场范围并深化分工^[12],这也是斯密主张自由贸易的理论依据。同时,交换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这要求生产要素和商品在市场上充分流动,因此斯密鼓励市场的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12]斯密指出,商品价格按要素主体可分为工资、利润与地租,即三要素分类法。此外,斯密还注意到地租在社会进步过程中有上涨的趋势,但整体来看各要素所有者之间处于一种和谐的分配关系之中,经济在长期内将稳定增长。以上分析表明,斯密从经济增长的视角描绘了一幅不断提高人类整体福利水平的经济图景。在斯密的逻辑体系里,自由的市场竞争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也是提高社会整体利益的根本手段。同时,斯密还认识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两面性:一方面是二者之间表现出一致性,他认为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另一方面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存在冲突的一面,他指出私人资本通过垄断使人们无法享受到自由贸易的利益,这为政府的适度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12]

2. 李嘉图的悲观预期

李嘉图时期,分配问题开始凸显。李嘉图指出,确立支配土地产品在地主、资本家及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这表明李嘉图开始转向研究分配问题。^[13]李嘉图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

增长的动力,而资本积累的动力源于资本利润率,后者又决定于商品价格和工资水平。根据劳动价值论,李嘉图认为商品价格由生产过程的劳动耗费量决定。生产条件一定时,劳动耗费量不会改变,工资将决定利润,并且工资与利润此消彼长。进一步地,李嘉图基于级差地租理论及农业边际收益递减假设指出,在社会进步及人口增长的压力下,贫瘠土地不断投入耕种,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地租在总产品中的份额不断增加以及货币工资不断上涨,利润必将下降,长期内经济将陷入停滞。^[13]李嘉图运用抽象演绎法,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联系,对长期经济增长作出了悲观预期。李嘉图对经济减速问题的关注源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当时,英国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与传统的地主阶级在谷物法问题上矛盾尖锐,前者主张废除谷物法以降低工资并提高利润,后者则希望通过谷物法以维持高额地租。李嘉图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主张废除谷物法,他认为进口廉价谷物可以减缓经济下降的速度。^[13]李嘉图分配理论的核心意义在于,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生产要素之间收益比例会发生变化,土地因不可替代性及有限性而具有某种垄断特征,从而在竞争中获得的收益比例不断增大,资本及劳动的份额不断下降,导致资本积累减少及经济增速放缓。

上述分析表明,斯密和李嘉图对经济增长前景持有不同的看法,这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及分析方法不同有关。斯密时期,人口没有对土地构成很大的压力,经济快速增长,分配问题尚未成为核心问题,因此斯密对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相反,李嘉图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地关系比较紧张,工资及地租上涨明显,同时李嘉图单一因素决定论式的独特分析方法也是他得出悲观结论的原因之一。

(二)收入分配

由于所处时代不同,约翰·穆勒对分配问题关注最多,李嘉图次之,亚当·斯密对分配问题关注最少。斯密在开创性地提出三要素分类法之后,认为长期内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处于一种相对和谐的分配关系中。李嘉图则继承了斯密的要素分类法,并通过深入研究分配问题开始对土地私有制进行反思。穆勒关注分配问题,他认为财富的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具有不同的性质: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科学的真理性质。^[14]然而,分配规律通常取决于任何特定社会通行的法令或者习俗,这成为穆勒出于社会整体利益而主张再分配政策的理论依据。^[14]穆勒的公正分配思想极大地丰富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

1.李嘉图对土地私有制的反思

李嘉图创立了级差地租理论并提出“地租—工资—利润”的分配次序,他认为地租与工资及利润之间呈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首先,在地租参与分配社会总产品时,地租与工资及利润之间彼此对立。在社会总产品给定时,地租越多,工资和利润则越少,而社会进步及人口增长导致地租上涨,因此工资及利润将随之下降。其次,在处于第二顺位的工资参与分配时,由于工资与利润成反比,二者之间又是对立的关系。在农业边际收益递减作用下,人口增长的结果是食物价格上涨,用以维持劳动供给的货币工资将上升,进而利润下降。基于以上分配理论,社会进步的结果是地租和货币工资均上涨,利润下降,经济最终陷入停滞。

上述分析结论使李嘉图开始反思土地私有制。根据李嘉图的分析逻辑,不同要素分配比例的变动导致经济陷入停滞,而这一变动的根源是土地私有制。在社会初始状态,土地广袤无垠,不会产生地租。随着人口逐渐增长,人地关系趋于紧张,而有限的土地却被地主私人占有,地租随之产生。由于土地要素不能随意增加,因此社会进步及人口增长的结果是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被地主所获得,导致分配比例严重失衡,最终阻碍了经济增长。因此,李嘉图从分配比例失衡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角度对土地私有制进行反思。但是,李嘉图的反思是相对温和的,他并没有提出激进的土地再分配方案。

2.约翰·穆勒的公正分配思想

关于社会进步与人口增长所导致的要素分配比例变动趋势,穆勒基本接受了李嘉图的分析结论。^[15]由于受古典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穆勒基于社会整体利益视角对土地私有制进行反思,且否定了土地私有制的神圣原则。^[14]穆勒从人类发展的状况出发,认为土地私有制等制度因素会造成不同个体之间的不平等,主张国家通过土地重新分配等再分配政策调整收入分配。

以上分析表明,李嘉图与穆勒虽然都认为经济增长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但二者对造成这一结果的

土地私有制的反思程度并不相同:李嘉图虽然对土地私有制提出批判,认为这会导致地主吸纳更多的社会财富,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是他关注的落脚点是经济增长,是经济效率问题;而穆勒对土地私有制的批判更为彻底,认为土地不是人们的劳动成果,土地私有制应在理论上符合人们有关公正的观念。^[14]穆勒进一步强调,如果土地私有制的实行对社会整体利益是不利的,则该制度就是不公正的,因此穆勒关注的重点是社会公正问题。^[14]从分配层次来看,斯密的研究主要涉及初次分配,且认为按贡献分配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李嘉图指出,在土地私有制及市场自由竞争条件下,初次分配将拉大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配差距;穆勒则基于古典功利主义哲学,主张通过再分配改进社会总福利。

从发展历程来看,古典经济学大致经过了从关注经济增长到关注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再到重点关注分配问题的动态演变过程。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正是对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回应。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古典经济学中所蕴含的共同富裕理论不断丰富,其中包括市场竞争的作用、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土地私有制的弊端、公正分配思想及政府的角色等。这些理论构成了共同富裕理论的早期探索成果,同时也成为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四、马克思奠定共同富裕理论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与继承,并通过反思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理论超越。马克思一方面对西方式现代化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在理论上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会导致社会分化,进而被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马克思认为,物质财富极其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反而会由于劳动异化使得劳动者陷入悲惨境地。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单纯地注重经济发展转向关注人的发展,这极大地丰富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对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反思

马克思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进步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表现出比以往社会制度更为突出的优越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5]。与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不同,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角度考察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理论上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与李嘉图的研究类似,马克思也从资本积累的动力着手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认为利润是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劳动的产物,而剩余劳动源于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即后者可以生产出超过其价值的产品,这部分剩余产品成为资本家的利润来源。资本家通过对剩余劳动的无限榨取以追逐利润,这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及社会财富积累的动力所在。激烈的自由竞争导致资本过于集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激化,进而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但是,马克思也认识到,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会通过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以缓解经济危机的危害程度或者减少其发生频次,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延续发展。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将发生质变,资本主义社会逐步走向消亡,共产主义社会取而代之。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理论成果进行了批判继承,并考察了分配比例失衡对经济增长的破坏作用,甚至可能会引发经济危机。同时,马克思还进一步考察了收入分配比例严重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即资本主义私有制。李嘉图在预期经济将陷入停滞之后,只是对土地私有制进行反思,并没有提出进一步的改良方案。穆勒通过对不同的财产所有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私有制是与人类当前发展状况最相宜的,同时,穆勒对土地私有制持有比较谨慎的态度,主张国家可以出于社会整体利益定期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与古典经济学家们相对温和的批判态度相比,马克思的批判更为彻底,他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思,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并提出替代方案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认为这可以避免分配比例严重

失衡及生产相对过剩。

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对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反思在本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是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其结果是被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通过对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反思和超越,马克思为共同富裕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作为对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回应,古典经济学仅仅关注经济发展,将共同富裕局限于物质生活富裕层面,基本未涉及精神层面的人的发展。马克思学说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价值目标,使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从一维的经济发展进阶到二维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这不仅大大推动了共同富裕理论的发展,也从另一个层面对西方式现代化道路进行了深刻反思。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异化劳动抑制了人的社会属性,进而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6]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作为生产投入要素被物化世界所控制,即人被“异化”了,而导致“异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家通过对工人的剥削而积累资本,使工人处于“奴役”状态并丧失了独立发展的机会。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社会的财富自由,却限制了人的自由。因此,马克思认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度前提。在共产主义社会,通过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根除了资本剥削劳动的制度基础,“异化”劳动随之覆灭,同时劳动者获得了独立发展的自由,可以有意识地从生产劳动,在劳动实践中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所指的“人”是指“所有人”,而不是“某些人”^[7],这体现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蕴含的共同富裕思想。生产力高度发达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因此经济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物质前提,而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归宿。

在共同富裕理论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中所包含的共同富裕理论进行了批判继承,对西方式现代化作了两点反思:一是西方式现代化所产生的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及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二是西方式现代化更侧重经济发展而忽视人的发展。基于此,马克思创立了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题的马克思学说,使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得到升华。另一方面,马克思学说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其中所蕴含的共同富裕理论为我们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共同富裕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8]这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表明共同富裕从马克思的理论探讨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基础上,推动了共同富裕理论体系的形成,在实践探索中推动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并推动了共同富裕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

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总结概括,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将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目标,并指出了具体的实现方式,共同富裕的理论体系开始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为适应新阶段的发展要求,共同富裕被提上发展的日程。

(一)对马克思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将共同富裕理论的内涵扩展为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两个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观点。马克思认为,西方式现代化过程中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及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的制度前提。早期,我国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两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在上述两大理论的指引下,我国实现了从温饱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转变,并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共同富裕在此历史转折时期被提上日程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可以说,这两大理论是对马克思共同富裕的重要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是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应坚持的理论前提。

(二) 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

与传统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将共同富裕摆在突出的位置,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成为时代主题。

1. 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这个提法明确了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在全部生产要素的改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我国城乡土地在二元土地制度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对城市土地而言,快速城镇化及工商业的发展增强了城市住房的投资属性。我国城市房地产行业的过度投资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使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的扭曲现象。同时,由于房价增值空间较大,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炒房,这进一步抬高了房价。我国城市土地投资过热改变了不同要素之间的收益比例,使社会财富的较大比重被土地资本所获得,从而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投资动力,使经济增长乏力。因此,中央出台“房住不炒”及“租购并举”的城市住房政策,同时,对房地产行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出台“三条红线”新规,以促进房地产行业的理性发展。对农村土地而言,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及宅基地退出模式是当前的主要改革议题。首先,补偿款标准是农村土地征收的核心问题^[19],传统上以被征地原用途为补偿基准损害了被征地农户的土地财产权益,因此部分学者^[20-21]主张对现有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进行改革,以更好地保护农民财产权益;其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为工商业资本的进入打开了制度窗口,对于节约集约用地及农村经济发展大有裨益;^[22]最后,快速城镇化带来了农村宅基地大量闲置的经济后果^[23],为激活闲置宅基地这块沉睡的资本,当务之急是探索宅基地退出模式^[24]。以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均需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以激发农村土地要素的活力,进而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2. 加大再分配政策调节力度,发挥第三次分配的补充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以及市场经济的竞争结果,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尤其是城乡及不同群体之间。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再分配政策的推出,收入分配差距虽有所收窄,但仍处于高位水平。^[25]需进一步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同时也需要认识到,实现共同富裕并不是劫富济贫,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要保持有差别的、合理的收入差距。^[26]部分学者^[27]研究表明,城镇化进程拉大了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差距。面对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不尽合理现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数次提到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这既是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政策回应,也是对第一次分配与第二次分配所做的有益补充。相比市场的初次分配与政府的再分配而言,第三次分配的行为主体是个人,通过个人自愿对外捐赠及发展慈善事业等,改善收入与财富分配格局。我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已经催生了富人阶层,他们成为当前提倡第三次分配的客观条件。同时,富人阶层从事慈善事业具有一定的心理动机,这可以满足他们的社会声誉需求,并对他们的商业活动产生积极作用。

3. 构建新型“政府-市场”关系,协同推进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较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协同效应,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成果。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古典经济学及马克思学说中均有所体现:从李嘉图对土地私有制所造成的经济停滞到约翰·穆勒对土地私有制原则的批判及政府干预经济活动

的必要性,均表明单纯的市场机制无法克服市场竞争所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不利于社会整体目标的实现。马克思则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主张通过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及按劳分配来实现经济良性发展及收入分配相对公平的社会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历了逐步演进,尤其是伴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的“功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这种新型的“政府-市场”关系对于稳步推进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的目标提供了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3年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我国经济的卓越表现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资源配置功能是密不可分的。政府采取的各项经济政策对于稳定经济增长、防止经济出现大幅波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就业政策方面,政府每年出台各项推动就业的政策,这既满足了企业的用工需求,也保障了社会就业率,稳定了经济环境;在产业政策方面,国家制订产业发展规划,对于新兴的重点产业提供扶持政策,这为我国部分产业的快速兴起创造了优越的制度环境;在应对国内外重大冲击方面,国家也主动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如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国家迅速推出财政刺激计划,从而避免了国内经济遭受巨大的损失。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这要求构建新型的“政府-市场”关系以应对新阶段的发展需要,尤其是要充分发挥政府在稳定经济环境及保障公平分配中的作用。在经济环境方面,我国已经难以依赖出口导向型政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内消费是未来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就要求政府不断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升广大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同时,农村土地改革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及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农村土地改革牵涉的群体非常广,不可能单纯依靠市场手段进行解决,这就要求政府因地制宜地制订审慎的改革政策,保障广大农户的利益不受损害,同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在收入公平分配方面,政府不仅要在第二次分配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且要在第三次分配中注意营造良好的社会公益慈善环境,鼓励个人积极行善,改善社会财富分配结构。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正积极探索以共同富裕为重要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新的征程上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要求我们不断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积极构建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并努力培育新型“政府-市场”关系,这既是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举措,也是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过程既要坚持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基本内涵,重视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又要吸收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刻认识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内在联系,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此外,还要密切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在新的征程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只有坚持这三项基本原则,才能够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

六、结语

当前,我国已经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正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因此,共同富裕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共同富裕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对共同富裕理论的研究有助于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理论指引,并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

通过梳理共同富裕理论的发展脉络发现,古典经济学主要围绕经济发展问题对共同富裕理论进行了早期探索,包括市场竞争的重要作用、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对土地私有制的批判等。马克思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继承,对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作了深刻反思,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马克思将发展的重心从经济视角转向人的视角,使共同富裕理论的内涵从一维的经济发展拓展为二维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为共同富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吸收了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经验,使共同富裕从理论探讨走向现实行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了共同富裕理论体系的形成,在实践探索中推动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并推动了共同富裕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

参考文献:

- [1]胡守勇.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溯源与演进历程[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2):21-28.
- [2]高帆.新型政府-市场关系与中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机制[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5-17.
- [3]史琳琰,胡怀国.高质量发展与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研究[J].经济与管理,2021,(5):1-9.
- [4]罗明忠.共同富裕:理论脉络、主要难题及现实路径[J].求索,2022,(1):143-151.
- [5]杨文圣,李旭东.共有、共建、共享: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10-16.
- [6]邱海平.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与实现途径[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4):21-26.
- [7]唐任伍,孟娜,叶天希.共同富裕思想演进、现实价值与实现路径[J].改革,2022,(1):1-12.
- [8]方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与实践研究[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2,(1):8-17.
- [9]范从来,谢超峰.益贫式经济增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实现[J].中国经济问题,2018,(2):3-12.
- [10]覃成林,杨霞.先富地区带动了其他地区共同富裕吗——基于空间外溢效应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7,(10):44-61.
- [11]Johnson E.. Professor Arrow's Ricardo[J].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993,15(1): 54-71.
- [12][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13][英]大卫·李嘉图,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大卫·李嘉图全集(第1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14][英]约翰·穆勒,著.金镛,译.政治经济学原理(上、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
- [15][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
- [1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7]刘卓红,刘倩.理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命题的三个维度:内在意蕴、当下形态与实现思路[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7):10-18+97.
- [18]卫兴华.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J].经济问题,2012,(12):4-8+114.
- [19]刘守英.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土地制度改革及其实施[J].法商研究,2014,(2):3-10.
- [20]王铁雄.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问题研究[J].法学杂志,2012,(3):43-50.
- [21]郭洁,崔梦溪.论农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市场标准及股权化实现的路径[J].法学杂志,2017,(2):56-66.
- [22]杨庆媛,杨人豪,曾黎,等.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促进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长研究——以成都市郫都区为例[J].经济地理,2017,(8):55-161.
- [23]魏后凯,刘同山.农村宅基地退出的政策演变、模式比较及制度安排[J].东岳论丛,2016,(9):15-23.
- [24]张勇,包婷婷.农村宅基地退出的驱动力分析——基于推拉理论视角[J].农村经济,2017,(4):18-23.
- [25]李实,朱梦冰.中国经济转型40年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J].管理世界,2018,(12):19-28.
- [26]郭关玉,高翔莲.共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J].社会主义研究,2017,(5):60-66.
- [27]谭智心.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比较研究——一个被忽略的差距[J].学习与探索,2020,(1):131-137.

[责任编辑:徐 蒙]